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五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一六期 ——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1f）

【史料辨正】文革口述史应该是信史——订正老田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的若干史实错误	何 蜀
【各抒己见】说老田治史	周孜仁
【研究评论】评《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青近军
【往事如烟】我们学校的叛国者	歪脖子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料辨正】

文革口述史应该是信史
——订正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的若干史实错误

• 何 蜀 •

〔作者说明：在本文发上网之后不久，由老田整理并“经黄廉本人初校”之后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又发到网上了。与原版比较，这个“修订版”只改了个别小错误（如笔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人名、地名错误），而对笔者和众多知情者所指出的重大史实错误却基本未改，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错误内容。这样对待口述史，实在太不严肃。对这种太不严肃的东西，本来不必再认真对待，但考虑到其在网上可能造成的影响，又不得不略作指谬，以正视听。现仅举两例：

一、老田整理的黄廉访谈录原版中说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大会是1966年9月28日下午举行的。笔者在本文中指出这个日期可疑，并曾向黄廉当面指出。“修订版”就略加修改，把日期推后两天，改成了9月30日下午，并且言之凿凿地说：“9月30日下午二时，我们取得占领市人民大礼堂的重庆中学生九一纵队主要负责人刘先裕等同志的支持，同意我们借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个说法既有时间、地点，又有具体人名（刘先裕），

多半会以为是很准确的了。其实，这个新的说法又增添了新的错误。只要对重庆文革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当时并无“中学生九一纵队”，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是在次年4月才成立的，1966年9月时只有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9月20日，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按市委授意，将日益倾向八一五派（即造反派）观点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强行合并（合并后改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9月24日，中学生红卫兵8000多人在市人民大礼堂集会，抗议其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强行合并，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向市委提出八项要求，未得答复。僵持至27日凌晨，数千中学生红卫兵出发“步行上京告状”。市委派出大批汽车、组织各校教师及家长到铁路沿线学生逗留的茄子溪、江津、永川火车站劝阻、拉回部分学生，但仍有1500余名中学生在永川登上火车，于10月6日到京。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临时主席团负责人刘先裕，9月30日时正在率队北上途中，怎么可能有“修订版”中所说的“同意造反军借礼堂开成立大会”的事？而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是在文革初期继重大八一五北上告状之后又一个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口述者和整理者居然能不顾重大史实编出不存在的故事，其他类似错误就可想而知了。

二、在“修订版”中，保留了原版就有的有关反到底派攻打嘉陵江大桥南桥头的内容，写得绘声绘色，不了解情况的人读了可能会信以为真，其实这又是在胡编“演义”。笔者在本文中已经指出，所谓打大桥的目的是为了“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是完全错误的说法，但口述者和整理者坚持不改，继续把文革中的派性武斗写得跟抗日战争和淮海战役一样“敌我分明”，似乎文革真如毛泽东所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笔者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其史实上的错误：当时反到底派决定打大桥，只是因为8月15日是八一五派的八一五造反周年纪念日，此前，反到底派得到消息，说八一五派为了庆祝造反一周年，要在14日晚12时打过大桥向反到底占据的江北区进攻。反到底江北指挥部遂作出决定，先发制人，你12点打过来，我就11点半打过去。于是在当晚11点半（并非田、黄文中所说的下午6点15分）开始炮击大桥南桥头八一五派武斗据点。此役黄廉根本没有参加决策和指挥，什么事先广播通知居民撤退之类纯属编造。按黄廉的说法：“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经历过，有些是当时听汇报的，知道多少说多少。”然而，这一段叙述却表明并非“知道多少说多少”，而是“不知道的也要胡编造”。这段文字后面还编造了一个荒诞情节，说“打下来之后要‘表功’，造反军和工总司都有人教我打电话给中央汇报，长安厂的人估计说：恐怕打了五六千发炮弹，江北指挥部的人说他们也打了那么多，这样我就如实报告给北京，为什么要打，以及打了一万多发炮弹。”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武斗，没有谁会以打赢了向中央“表功”，都只会争着诉苦，强调自己是自卫，讲自己被打死打伤多少人。谁会要黄廉向中央汇报“表功”的？当年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也是工总司一号勤务员、军工井冈山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就在江北指挥部坐镇，了解此役全过程，从未听说过有此事。据历史资料记载，所谓重庆武斗一个晚上打了一万多发炮弹，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向周恩来汇报的，而且也没有说这一万多发炮弹是哪一派打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到底派“表功”。

总之，在老田整理的这个黄廉访谈录中，史实错误极多，对待历史极不严肃。笔者特将本文再次发出，有兴趣者不妨对照阅读。

编者说明：本刊所刊“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文本为修订版，作者对本文指出的部分错误已经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

记录整理口述史，是一项有意义的严肃的工作。口述史，其内涵是“史”，“口述”只是其表现形式。但是，因“口述”这一形式的随便谈、不严谨的特点，一些整理者就忽略了治史应有的严谨，只满足于有闻必录的记录，而忘记了应有的“整理”的责任。即使整理，也只满足于作一些文字修辞方面的整理，而未能进行更为重要的鉴别真伪、查证史实、纠正记忆错误等方面的整理。这样，就必然导致错误百出的“口述史”草率问世。2004年9月下旬出现在

网上的由“老田”记录整理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以下简称“田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本来，田文从一个大城市文革群众组织中较有影响的一大派领袖人物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回顾文革发展的全过程，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口述史。然而，读过全文之后，却令人感到极为失望。田文表明，整理者完全不了解重庆的情况，不懂得“文化大革命”为何物，对所记录、整理的“史”的内容既缺乏必要的前期研究，又未作广泛深入的调查采访（据口述者称只找他谈了两天）和查证鉴别工作，在整理完成后又未给口述者过目审看，就匆忙抛出，这样的记录整理，岂有不出现大量错误的？

老田整理的这个“口述史”，史实上的错误太多，其中不少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识性的错误，实在不值得也难以逐一订正，但因其在网上发表后已经引起一些反响，不予订正则有可能误导后人。因此不得不择其要者指出问题所在，以免谬误继续流传。

田文中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

◇ 时间错乱

时间的错乱是田文最明显的问题。

1、田文在开始介绍口述者黄廉个人简历时：谈到“在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带人砸了之后，继续主持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指挥部”，令人莫明其妙。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而非“指挥部”），即反到底派工总司，是196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红五条”）下达之后才于6月间成立的。而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被砸，是在此前的1月，当时并不存在工总司这个组织，何来“继续主持”一说？

2、田文中第二节谈到黄廉在文革初期被关押，南下串联的学生把他救出来，“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北京传单，上面是江青讲话什么的，还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

十六条发布是1966年8月8日，田文中说黄廉被南下串联学生救出后上京，参加了8月31日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集会。因此，此处所说的重庆街头“还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自然是8月中、下旬的事。但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在北京最早出现也是年底的事了。据史料记载，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纠集清华附中及北京十二所中学红卫兵（都是早期红卫兵）采取联合行动，在清华大学礼堂一带“戒严”，把校内出现的批评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全部撕毁，可见，当时在北京连“批评”（而非“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也不容许出现。直到12月2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全体人员会议，蒯大富才提出将“打倒刘少奇”口号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动计划。25日，蒯大富亲率清华井冈山5000多人上街游行并到各大街写标语、发传单，号召打倒刘、邓。这样的标语，能在8月里就出现于重庆吗？

3、田文说到“重庆市委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八一五罪行展览……”黄廉在单位上也受了批判，心里很苦闷，几个南下的学生护送他去北京，去后不久就是8月31日的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工卫兵……

这其中的时间错乱实在太离谱。田文所说的江北上横街的事，是重庆文革史上有名的“八二八”事件，发生于1966年8月28日。保守派从8月31日晚上开始发出攻击重庆大学

八一五的传单，全市从9月1日以后才开始了造反派的围剿。按田文的记载，黄廉在“八二八”事件之后在单位上受到批判打击（那就应该是9月里的事了），然后才去了北京，怎么可能碰上“八三一”的大会呢？

4、田文中说，黄廉在北京期间（即参加“八三一”、“九一五”两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集会期间）会到了又一批重庆来告状的工人造反军，“又听到一曲他们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他们打着旗子，从重庆步行到永川，在永川还把铁路拦断了一段时间才坐上火车”。

这又是不准确的。按田文所记，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是9月间的事，实际上，工人造反派大批上京告状，主要出现于1966年10月至11月间。从现存“文革”时期“中央首长讲话”可知，在10月下旬以前，几乎没有中央领导人接见工人代表的讲话，此后才陆续有了10月30日陶铸接见湖南工人、师生、干部代表，11月10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包括少数工人），11月12日陈伯达与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11月15日唐平铸接见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来京代表，同日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来京工人代表，11月17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座谈，同日王力、姚文元接见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11月19日刘宁一接见无锡来京工人代表（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重庆当时上京告状的工人造反派，人数较多的先后有过几批，其中最大的一批，就是由叶祖禄（田文中错记作“叶祖龙”）率领的那一批。据亲历者回忆，那批各单位工人造反派约800人，步行到璧山后被市委派车接到永川改乘火车到北京，他们赶上了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在京期间，他们还就《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11月10日发表）引起的意见走访了《人民日报》社，得到唐平铸接见。这都显然不可能是9月间的事。另据史料记载，11月13日，重庆工人造反军300人在江津小南海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上车，致使火车停驶3小时（《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405页）。而重庆造反派在9月里拦截火车上京告状的只有两次，分别是重大八一五等大中学校（9月上旬）和中学校红卫兵总部（9月下旬）。当时，学生造反派都才刚开始组建，工人造反派远没有发展到那样的规模。如果真的在9月份就发生了那样的重大事件，肯定会比后来在11月10日才发生的上海工总司拦截京沪列车北上告状的“安亭事件”更为轰动并被“载入史册”，因为它太超前了。

5、田文中说，在文革初期，重庆市委很不公正地把“肖（泽宽）廖（伯康）李（芷洲）”打下去了。

这个说法也是很 inaccurate 的。重庆的“萧、李、廖”（而非“萧、廖、李”，李止舟也不是“李芷洲”），是早在1963年4月23日至5月8日召开的重庆市委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就被当作“反党”问题“打下去了”的。到了“文革”初期，重庆市委又按照西南局李井泉的旨意，把“萧、李、廖”重新抛出来定为“黑帮”。并不是在“文革”初期才把他们“打下去了”。

6、田文谈到重庆工人造反军成立前后情况时，在时间上特别混乱。口述者实际上把整个情况发生的时间提前了。文中说黄廉9月份在北京听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中讲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回到重庆后，于9月28日召开了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各地来京工人代表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是在11月份。因为当时各地工人运动开始起来，就有了工人建立组织、上京告状影响生产的问题，各地党政领导也纷纷为此向中央告急。中央文革就在接见群众讲话中反复讲这个问题，并经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于1

2月9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明确规定工人可以成立文革群众组织）。在9月份的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中尚无此类主题，当时讲的主要是学校中两派群众（多数派与少数派）的矛盾问题、学生外出串连问题等。而田文中说工人造反军在9月28日就召开了成立大会。这个“具体日期”也很不可信——而且按田文记载大会的次日又进行了大游行，“整整一天都是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里转。”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马力在一份随《新重庆报》附送的《检查》材料中回忆：“九月十八日晚，根据（工交）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化研所等六个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这说明“国庆节前后”尚无工人造反军开大会之事。另据1968年3月由四川几大群众组织合编的《四川工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记载：“10月初，成都、重庆、自贡等地工人先后在本单位成立与保守组织针锋相对的革命造反组织。”这本书的八个编辑单位中，名列第三的就是黄廉主持的重庆工总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这个历史记载自然应该比他现在的回忆更为可信。

7、田文中还提到，罗广斌叫黄廉找点有文化的工人，预备在1月25日这一天去夺电台的权。此说也完全不对。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是在1月14日就被造反派宣布夺权的。因此罗广斌不可能叫黄廉准备在1月25日去夺权。如果说口述者记忆有误，那么整理者只要认真了解一下当时重庆文革的背景就会知道这个日期是错误的，因为重庆造反派向市委、市人委（现称市政府）夺权是在1月24日至26日进行的。此前，广播电台、报社都已完成夺权，并成为夺重庆市党政大权的主要发起单位。怎么可能到了25日才来准备夺广播电台的权？

8、田文中说到黄廉到北京之后，因贵州李铁乃事件而莫名其妙被卫戍区关了又放了，“我走出卫戍区，就看到中国氢弹爆炸的喜讯。”

这从口述者来说是记忆错误，而从整理者来说则是太不了解历史和缺乏治史的严谨作风。对口述者的回忆，无论如何也是要查证、鉴别的。我国公布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有两次，一是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当时报道的是“我国在西部地区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二是1967年6月17日：氢弹空投试验成功（当时报道的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的当天是3月9日（在市中区牛角沱车站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算上他此前在西安和成都逗留的时间，他在北京从卫戍区出来应是在2月底或3月初，他能看到此后的6月里才会出现的“氢弹爆炸的喜讯”吗？显然不能。

那么，他是否看到的是此前12月底的那个喜讯呢？不了解文革情况的人可能会认为有可能（老田就这样认为）。然而，在文革中，每天贴出的标语、传单、大字报数量之多，覆盖街道墙面、门面范围之广，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因为张贴地点（特别是有利于民众观看的显眼的地点）有限，大家都争着要贴，于是就经常发生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为了保证“大民主”得以正常进行，人们终于有了个约定俗成的原则：保留三天。最初是在标语、大字报的天头、地尾处写上“保留三天”（如果标语、大字报是由多张纸接成，则每一张都要写），后来，有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张贴物不被别人覆盖，就加上威胁性的语句：“保留三天，否则格撕勿论”。除去被覆盖的危险外，还有被撕毁的危险，当时有两种撕毁张贴物的情况，一种是反对派，看着不顺眼就给你撕了，另一种更有时代特色，是夜深人静时，收废纸的老太太或小孩一大片一大片地撕，第二天拿去卖钱。这种情况，连毛泽东也知道了，在1968年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的讲话中就说到：“小孩子揭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谢富治插话：“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当时，有人为了不被别人撕毁，就写上辱骂式的“保留三天，王八才撕”，还有的写上独具时代特色的“保留三天，刘少奇的儿来撕，王光美的女来盖”；还有的含蓄一点写

成“保留三天，否则嘿嘿……”，更有的干脆在“否则”后面画上一柄正在滴血的匕首……总之，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张贴物能在墙上保留三天，人们费尽了心机。保留三天尚且如此艰难，一幅大标语能在显眼处保留长达两个月之久吗？

9、田文中还说，黄廉1967年2月从北京回到重庆后，看到街头有标语“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

这也是错误的。首先，在“二月镇反”时并无“砸派”这个称呼，当时对反革联会、反重大八一五的一派，有时称作“联络站”或“廉罗栈”（廉指黄廉，罗指罗广斌）派。“砸派”的名称是在这年4月开始否定“二月镇反”后，曾被镇压的这一派提出“砸烂革联会”而得名的。而要“砸派留下遗书”，则是在此后5月份的事，当时中央“红五条”下达，没有承认革联会的合法存在，“砸派”欢欣鼓舞，“砸烂革联会”的呼声更加响亮，被激怒的八一五派便有标语提出“要来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5月28日，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回应八一五派的这个标语，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此《遗书》刊登于小报，翻印有传单，并转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大街小巷，脍炙人口。

10、田文中说到重庆“二月镇反”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工总司也没有了”，也是莫名其妙。当时工总司本来就没有，是后来才成立的。与“二月镇反”何干？

11、田文中说：“武汉720事件之后”，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打电话给黄廉，要他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

这在时间上也不对。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到7月25日，重庆两大派才开始动用枪支武斗，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这时才拉开序幕，“七二0”后还没有出现大批难民外逃的情况，怎么会有张国华叫黄廉到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的事？反到底派大批逃到成都，是1968年春又一次大规模武斗时的事。

12、田文中说到重庆武斗中，朝天门码头被八一五派占据了，“改称红港”。

这真是笑话。朝天门改称红港，是1966年8、9月红卫兵“破四旧”中街道、商店纷纷改换革命名称时的事，重庆人所共知，当时报纸也有报道。怎么变成武斗中一派占据了才改名？

13、田文中说到1969年8月底在灌县办学习班时，“也是在北京会议上，邓长春和方文正被逮捕了”。邓长春、方文正在北京学习班被捕是1968年11月7日至8日的事。怎么扯到1969年的灌县学习班去了？

14、田文中说：“我们在（群众）组织解散之后进入革委会，群众的组织渠道没有了……”这个说法在先后顺序上就是错误。事实上重庆是革委会成立在先，群众组织解散在后。重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各大总部是在革委会成立（1968年6月2日）之后才解散（1968年10月15日）的，基层组织有的则更晚一些。

总之，这类时间上的错乱实在太多，只会让不了解情况的人摸不着头脑。

◇ 人名、地名错误

15、田文中说到重庆解放初期，“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曲靖中学报名”。这

个“曲靖中学”也是错的，重庆哪有这个学校？只有个读音相近的“求精中学”（即后来的第六中学）。

16、田文中提到“文革”初期被市委抛出来批判的“张立群”，应为张黎群，而且也不是市委抛出来批判的（他本来就不是重庆的干部，而是从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任上贬下来到西南局办公厅任副主任，文革前夕又被贬到四川省绵阳地委任副书记），是西南局李井泉把他抛出来作为四川头号“黑帮”批判的。

17、田文中提到的造反军总部“叶祖龙”，应为叶祖禄。

18、田文中提到的五十四军副军长“白冰”，重庆人人皆知应是白斌。

19、田文中提到的贵阳地化所的“许英年”，应是徐英年，“文革”中贵州夺权大名鼎鼎的造反派领袖之一。

20、田文中提到的重庆军工井冈山负责人之一“周永古”，应为周应古。

21、田文中提到的“造反军下面的刘祖贵”，应为刘祖国，他也不是“造反军下面的”，而是二七战斗团反到底派（二七战斗团有两派）的负责人。

22、田文中提到重庆反到底派中一个组织“水运的航锋”，应为河运学校的航锋，这也是重庆众所周知的一个群众组织。

23、田文中提到的四川省革筹“郭一明”，应为郭一鸣。

24、田文中说“江北上新街到长安厂一线是反到底控制”，又是笑话。重庆的江北（嘉陵江北岸）没有上新街，只有上横街，上新街是在南岸（长江南岸），大方向完全错了。而这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是口述者记错或说错的，只能是对重庆情况太陌生的记录整理者写错的。

这类错误，如果老田在整理完稿后给口述者本人看过，许多都是应该能改正过来的。

◇ 听错语音或不懂方言造成的错误

田文中有些地方明显是整理者听错了口述者的语音或未能听懂口述者用的方言而导致的错误。

25、田文中说：“八一五和军队说刘张是乱萝卜”，当年八一五派确实是攻击四川省革筹组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二人，但骂他们是“烂萝卜”，而非“乱萝卜”——而且，此句中“和军队说”一语，也不准确，因为当年军队虽有派性，却不可能像八一五派那样公开发表这类辱骂省革筹领导人的言论。

26、田文中说到反到底派在武斗中要求发枪时，“邓长春说黄枇杷不批我来批”。此处的“黄枇杷”，不知者会以为是黄色的枇杷之意，其实是“黄屁巴”，这是整理者不懂重庆方言。当时反到底派中的一些人讥称黄廉为“黄屁巴”，所谓“屁巴”，是重庆方言中“屁巴虫”的简称，也称作“屁眼虫”，一般用来骂向上司打小报告或给下属穿小鞋之类人，或说“那是条虫”。若发现某人有此类行为，则称之为“装虫”。

27、田文中在“批清运动和四不准学习班”一节里有一句：“我料死你们的书记和局长，也不清楚现在形势的本质……”此处的“料死”让人不知所云，其实，这是一个重庆方言词，可写作“量视”或“量适”，“我量视你……”有时也简单说成“我量你……”，更强调一些鄙夷语气时就在“你”字后加上“娃娃”成为“我量你娃娃……”，是带有鄙夷和激将语气的“我断定你不敢……”、“我敢肯定你不能……”之意。

前面提到的人名、地名方面的错误，有不少也是整理者听错口述者的语音而造成的。

◇ 涉及文革历史的常识性错误

28、田文中说到黄廉1966年9月从北京返回四川，路经成都时，说“红成虽说是保守的，但是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

此处是常识性的大错。1966年9月时造反派组织刚刚兴起，尚处弱势，红卫兵成都部队到10月11日才正式成立。即使口述者不知道或不记得红成正式成立的具体时间，也应知道当时红成是成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全市性统一组织，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这时还是红成的一个成员单位，称“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以后与红成总部决裂拉出去，才改称“红卫兵川大支队”。

29、田文中说到黄廉1966年10月刚开始造反时，被罗广斌找去谈话，“罗广斌最后对我说，要注意政策，问我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文革初期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个说法？历史的真相是，直到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才首次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的提法。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中，才首次归纳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罗广斌能提前整整一年提出这个说法吗？

30、田文中说：“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

这个说法也莫名其妙。重庆工人造反派并非只有造反军，而八一五派也并非只有学生，这是起码的常识。就说工人造反军，也有不同的山头，其中实力雄厚的工人造反军二分团，就一直站在重大八一五一边，是八一五派的一支重要力量。重庆的造反派工人与八一五学生联合的多了，如八一兵团、二七战斗团、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其实，不仅重庆，全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当时的不同派别都不能简单地以职业、阶级或阶层来划分。而这是并不老的老田所不了解的。然而老田却自以为发现了文革的规律，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谈谈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落差》发到网上，大谈什么“工人和大学生的政治分化是全国性的。重庆处在分化的一个极端上，而且分化很早发生，也很深刻，学生因此被当权派利用……”云云，实在叫人不知说什么好。

31、田文中说：“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与对面交电大楼上815的红旗广播站对垒。各人发布自己一派的重大的事件……”

这是整理者不但不了解重庆的文革情况，而且连重庆起码的地理常识都没有。友谊商店的对面不是交电大楼而是群林市场（时称工农兵市场），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对垒的是群林市

场的八一五派“痛打落水狗”广播站，而八一五派的红旗广播站则设在另一侧隔着几栋房子的街对面的红旗糖果店（原名大众糖果店）楼上。

3 2、田文中说“革联会主任是重大的一个校工刘”，更是天大的笑话。重庆人谁都知道革联会主任是五十四军派出的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怎么变成了重大的一个校工？

3 3、田文中说到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时说：“（周恩来）接着就念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协定。革筹主任是五十四军兰亦农，副主任刘润泉和唐兴盛……”

中央五条不是“协定”而是“意见”（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而重庆市革筹组没有主任、副主任，只有组长、副组长，副组长是白斌而没有刘润泉，唐兴盛不是副组长只是革筹组成员。

3 4、田文中说重庆两大派“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施家梁”，不对，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于1967年6月5日至8日发生在西南师范学院，时称“六五一六八”事件。施家梁一战只是这次大武斗中的一个局部事件，一个插曲。

3 5、田文谈到反到底派要打嘉陵江大桥时说：“反到底的总部在上清寺”，“我们总部设在体育馆附近，上清寺一带在我们手里……”

这是整理者毫无重庆地理常识而闹出的又一笑话。反到底的工总司设在重庆市体育馆，但体育馆不在上清寺而在两路口——两地相距公交车一站路。因反到底派占据了两路口一带的体育馆、重庆市文联、宽银幕电影院等地，所以两路口一带可以说在反到底手中（但也不是全部），而上清寺一带则不能这样说。如果上清寺一带已在反到底派手中，还用得着打嘉陵江大桥吗（被八一五派占领的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就属“上清寺一带”）？

出现这样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说明整理者事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做得太不够。至少，当年《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这个事关重庆文革大局的“红五条”，总该找来读一读吧？

◇ 细节失实

3 6、田文中说到工人造反军成立后，罗广斌约黄廉去文联谈谈，说罗广斌“当时是作协主席和重庆市团委书记”，还说黄廉问他，“他说力争不当走资派。”

这些都错了。罗广斌当时只是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即专业作家），既非作协主席（当时重庆也没有作协）也非团委书记。他不属于“当权派”，自然也就说不上“力争不当走资派”了。

3 7、田文中说到黄廉上京汇报时，对文革接待站的人说：“在困难时期过后，毛主席都有检讨……”

这完全不对，是把今天的认识放到那个时代去了。那时候除了高级干部，没有谁知道毛泽东曾为“困难时期”作过“检讨”，在文革那样的空前个人崇拜狂热气氛中，更不可能有人敢于公开这样说。因为按照当时的认识，“困难时期”并非毛泽东的责任，而是刘、邓一类“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说毛泽东为此“检讨”，不怕被定下“恶攻”的罪名？当然，后来一些红卫兵出版的未发表过的毛泽东文章、讲话资料（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中，也有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承认对三年困难时期负有责任的事。但这些资料都是在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时期才得以出版的。而按田文中所说的黄廉上京是196

6年9月，当时黄廉是不可能看到这类讲话的，更不用说还敢公开当作根据来讲了。把今天的认识放到那个时代，用今天的认识，来改变历史中人物的观点，以至解读历史中的人物立场，是对历史的错误修正与歪曲。

38、田文中说到黄廉在北京时看到“清华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郭沫若、林枫……”也是错得莫名其妙。郭沫若除去在“红八月”时被红卫兵贴过大字报以外，从未被弄到大会上去批斗过。

39、田文中说，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被砸后，黄廉“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并且马上提出口号，成立‘打李联络站’。”重庆谁听说过这个“口号”？所谓“打李联络站”应为“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简称“打李总站”，是成都的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后来成立的。四川各地（包括重庆）同一派观点的组织以后陆续成立了“打李分站”，不过一般只是个起宣传作用的名义而已。

40、田文中在讲到“二月镇反”时，莫名其妙地插入了一段讲“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说“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反到底方面一个最著名的广播员叫做谢掰掰，他当时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红声，其实他并不是掰子，他总是这样开头：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由广播员谢掰掰负责广播。”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此处所说的“谢掰掰”，“掰掰”二字只是其音，是重庆方言，“掰掰”即“跛子”，一般将此字写作“足”旁加“拜”字（因电脑字库中难找此字，暂以“掰”代替）。反到底派有名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广播员既不姓谢，也不是“掰掰”，所谓“谢掰掰”是八一五派讥讽、丑化反到底派广播员的称呼。当然反到底派广播员更不会自称“广播员谢掰掰”了。至于“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的说法也不符合当时的习惯，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广播站通常都说：“某某广播站现在开始战斗！”

41、田文中说到“二月镇反”后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这也错了。请想想，文革发展到1967年春，全面内战尚未开始，周恩来怎么会说“天下已治蜀未治”？周恩来此语是在1968年的“三一五指示”中说的。那时不少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走向了“大治”，而四川还在武斗分裂，因此他才说了这句话。

42、田文中说到中央解决重庆问题时“温白桦也参加了会议，他说54军搞革联会十分草率，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

这也不对。请想想，温伯华在1967年夏重庆两大派大规模武斗期间被周恩来派来重庆作联络员了解情况，怎么可能在此前的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上说出那样指责五十四军的话？而且指责得毫无道理——五十四军哪里是“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在筹建革联会时五十四军就推荐了工人造反组织八一兵团的负责人阳增泰和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负责人王绍川。说革联会只依靠学生，这是当时反革联会一派攻击八一五派的观点（“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以十二所大专院校为主体，排斥工人组织……”），温伯华这样的“中央代表”会说出这样没水平的话吗？如果他这时就这样派性十足地指责五十四军，后来武斗期间周恩来会派他到重庆作联络员吗？整理者稍微动动脑子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43、田文说“二月镇反”后黄廉被五十四军从监狱中接出送到北京后，“晚上去人民大会

堂开会”，在会上周恩来就说“回去准备成立市革筹。接着就念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协定。”

这又是不了解历史情况而想当然的记录。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哪里会这么简单！当时，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由周恩来主持，从1967年3月起先解决为四川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平反翻案问题（用当时的话来说是作为解决四川问题的“突破口”），然后，从4月起连续召开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重庆代表先参加了解决四川问题会议）。5月初，解决四川问题告一段落，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随即专门召开单独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直到5月16日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为止。整理者把在长达一个多月时间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浓缩到一个晚上来完成了。

44、田文中说到武斗期间一次反到底派的重要会议，“反到底六大总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论非常激烈，徐光明还昏了过去”。

这也不对。六大总部负责人中没有徐光明。徐光明只是人数极少的井冈山红卫兵的负责人，因其独特个性，人缘不大好，六大总部中的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就没有他的位置。至于徐光明在会上激烈争论中昏倒，据知情人讲，也是全面内战之前一次另外的会议上的事。与六大总部会议无关。

45、田文中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鲁大东对黄廉说“你要注意安全，谨防别人在背后捅你一刀，要回家去叫市委给你派车子”。

这也是很荒唐的。“九五命令”下来时，重庆两大派武斗告一段落，而此时鲁大东还属于批判、打倒对象，并未“解放”、“结合”，他怎么可能以领导人的身份与黄廉说话？还说什么“市委给你派车子”，这时还有市委吗？整理者实在是太不了解文革历史了。

46、田文中说：“1968年三月，在北京政治学院集合，这是中央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几条指示，每一条都是对八一五极为不利的，把67年大武斗中间的矛盾和纠葛，都几乎要算在五十四军和八一五头上了。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下达之后，五十四军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军队没有一碗水端平。八一五回去之后思想立场没有转变，仗着军队的支持，还是坚持一派夺权，坚持以我为核心……”

这里所说的1968年3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即一般所称的“三一五指示”或“三一五讲话”。这是当年四川全省传达到家喻户晓程度的一个重要讲话。现在也不难找到讲话原文。但是，原讲话中却并无田文中所说的“把67年大武斗中间的矛盾和纠葛，都几乎要算在五十四军和八一五头上了。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下达之后，五十四军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军队没有一碗水端平。八一五回去之后思想立场没有转变，仗着军队的支持，还是坚持一派夺权，坚持以我为核心”这些内容。讲话对八一五派和成都红成派的批评，主要是“打倒刘、张”问题，对重庆武斗的批评，则是针对两派的，而且，讲话中也有对反到底派的不点名的批评，即“为罗广斌翻案”和“为川东地下党翻案”问题，而这是让反到底派十分被动的——因为反到底派一直在“为罗广斌翻案”，而且就在“三一五讲话”的当天，重庆反到底六大司令部之一的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主编的《机关反到底》报第3期，就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为川东地下党翻案”的文章《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关于李廖死党全盘否定四川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打击迫害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调查报告》。

47、田文中说到1968年5月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学习班代表宣布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文件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光头出来讲话，读了几遍‘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东方红响了两三遍之后，毛主席出来跟大家握手，招了招手就进去了。

后面一下子乱了套，人们从我的肩膀上踩过去，桌子上的小喇叭都被他们踩乱了。主席台有周总理和康生，宣布开会，念中央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文件和常委以上的名单……”

这是可以很容易鉴别的口述者的记忆失误。毛泽东根本没有在中央宣布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接见会上出来接见四川代表并“跟大家握手”——在场的“大家”是多少人？怎么握法？了解文革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毛泽东当时从未单独接见过任何一省在中央学习班学习的代表（四川代表不可能有此殊荣），他从来都是同时接见一批不同单位的代表，而且都只是在主席台上走一下，向大家挥挥手，亮个相，就算人们的“最大幸福”，不可能“跟大家握手”。实际上的情况是，在1968年5月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代表等；5月20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党政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全国煤炭会议代表等。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的代表得到毛泽东接见，实际上是在5月20日那次。此后，在5月28日晚上，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全体代表。在他们出场时人们高呼了一阵“毛主席万岁”，当周恩来和江青招呼大家坐下时，人们又呼了“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接着就是由康生宣读中央批示同意四川省革委会成立的文件。这一次根本没有毛泽东出来接见的事。这是有当年传达文件和翻印的资料可查的。显然口述者把前后两次不同的接见记混了。但整理者理应进行一番鉴别查证工作。

◇ “演义”式的虚构、编造

田文中还有不少地方以“演义”手法虚构历史人物的动机，编造并不存在的史事。这也是这篇“口述史”引起许多历史当事人反感的原因之一。

48、田文中说到重庆“一二·四”事件时，说：“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鲁大东还准备亲自主持他们的示威大会，还准备在会上讲话……”并说黄廉在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规模武斗发生后“我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

这都是毫无根据之说。市委领导人鲁大东等当时唯恐有从“三类干部”变为“四类干部”（打倒对象）的危险，竭力想避免发生群众冲突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得知“保守派”要开大会，造反派要去冲会场造反时，就力劝“保守派”不要开会，力劝造反派不要到会场去，但均未起作用。鲁大东当时并没有到现场去，而是在得知会场上发生冲突后，派了市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随后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也征得鲁大东的同意到了现场帮助做疏散工作。当然更没有什么“市委一声令下，保皇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一二·四”事件后，市委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怎么可能“一声令下”？下的什么令？有谁看到或听到过？实际上，“保守派”也并非在那时就“不再公开活动了”，只是因为遭到造反派的打砸揪斗而溃不成军，一部分人员一直坚持活动，并组织上京告状，到“二月镇反”时还准备恢复组织。何况，“保守派”连市委力劝其停开大会的要求都不答应，还能听到市委“一声令下”就停止活动吗？

49、田文在“造反派内部裂痕的扩大与一月夺权的迷茫”一节中说：“市委又采取新的手法，在造反派内部收买新的组织，进行分化瓦解，”

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演义”。请问：当时的重庆市委收买了哪个“新的组织”？是怎么“收买”的？事实依据何在？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还以这种想当然的叙述来写文革历史，实在太不严肃。

50、田文中说，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成立后，“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

也……”

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成立于1966年底，那时市委已经基本瘫痪，市委领导都处于检查、请罪的地位，哪里还会发什么攻击造反派领袖的简报？“三个简报”到底是哪三个？什么内容？何时发出？通过谁来发？

51、田文中说：“八一五总团认为周家喻跟工农联合是不对的，首先中了走资派的反间计”。

这也完全是凭空编造。八一五总团什么时候“认为周家喻与工农结合是不对的”？他们中了哪个走资派的反间计？有何文字、史料依据？恰恰相反，不仅八一五总团，其他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一样，在文革中从未有人会认为与工农联合不对，而是全都积极热情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直大力提倡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作为“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会公然逆毛泽东之意而行吗？而且，即使说八一五不与工人造反军总部联合（到底是谁不与谁联合其实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谈不上是不与工农联合，因为重庆的工农并非只有工人造反军才能代表，八一五派中，就有强大的军工企业的八一兵团，有比工人造反军还先成立的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有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有红农八一五战斗团，甚至还有工人造反军中实力雄厚的二分团……他们都是工农，能说八一五不与工农联合吗？

52、田文中写到反到底派攻打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一役时，说：“市中区的上百万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没有粮食和蔬菜供应。这个时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桥，从江北运进粮食和蔬菜……反到底总部和工总司都认为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这一仗打完之后，反到底士气大振，老百姓也认为反到底好，我们还出了很多布告，工总司是很威风，街上的人看到我们，眼光中就充满着敬意。”

这也是十分荒唐的“演义”。只有对文革历史毫无了解的整理者才会“整理”出这样拙劣的文字。“文化大革命”不是抗日战争，不是淮海战役。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不是敌我矛盾，尽管武斗中重庆两大派各占有一定地盘，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却并不是都会同时赞成或拥护哪一派观点的，在八一五控制区有反到底观点的百姓，在反到底控制区也有八一五观点的百姓，就是在一家人中有不同派别观点也是很常见的事，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逍遥派”，还有一些被剥夺了参与政治运动权利的“黑五类”，更还有许多执行支左、军管任务的驻军指战员……怎么可能是“市区上百万老百姓”都被八一五派“困住了”，都“认为反到底好”？而八一五派也不可能把“市区上百万老百姓”困住，因为这上百万人中并非都是反到底派观点。实际上，八一五派当时在市区的势力更大，人员更多，按照田文的说法，八一五派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对文革历史稍有点常识性的了解，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

53、田文中关于黄廉未能进入四川省革委会当上副主任一事的叙述，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文中说，黄廉没有被选上省革委副主任后，省里要员们一齐找他，向他道歉，说“关于你的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怎么没有你，我们感到不好解释……”李大章还说：“主席说了嘛，造反有黄廉，怎么进革委会没有黄廉了呢？”

如果真是这样，毛泽东真的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四川省革委会的领导人们竟敢不马上“照办”，居然一面向黄廉道歉，一面顶着不办，仍不把黄廉补为省革委副主任（本来省革委副主任就留有两个空额），他们是吃了豹子胆？当时毛泽东的话具有何等分量！“一句顶一万句”，一有“最高指示”下达，传达不走样，落实“不过夜”，这是谁都知道的。当初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来后，毛泽东明确表态给予热烈支持。下令登报广播，这一下引起轩然大波，中央调查组到北大调查后向康生反映，聂元梓有不少问题，群众影响不好，反应强烈，当初不该让她来领头。康生就说：“（聂元梓）就是王八蛋也要支持！”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在那里。如果说毛泽东对黄廉进省革委一事已经有了明确表态，省革委领导人岂敢不坚决执行？

总之，大凡对重庆文革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读了这篇老田整理的“口述史”，都无不认为史实错误太多。对文革口述史像这样整理，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负责任，只会使已经被那些“演义”式的纪实作品、“戏说”式的影视作品搞得混乱不堪的文革历史更添混乱。至于以这样的“口述史”作为依据来“总结经验”、“构建理论”，那就更不足取、不足信了。

~~~~~

## 【各抒己见】

### 说老田治史

• 周孜仁 •

文革，作为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一件大事，对这段时期史料的搜集、抢救、整理和研究，无疑是非常宏大而重要的历史性工程。无数学者尚且穷经皓首整理古代典籍，每从墓坑地底掘出旧砖古瓦、残篇断简，都会兴奋无已，都想从中找出某个新证据、补齐某节断裂史。文革过去不过几十年，许多当事人、参与者尚在，如果不抓紧把若许活证据、活史料留下来，对于后人来说，岂不是万难原谅的历史罪过。

老田，不知何许人也。听说是武汉市某房地产商，老板级人物，发了许多财的。老田发了许多财而不嫖不赌，把充足财力和充沛精力用于文革史搜集、整理和研究，还自费奔波，寻找文革当事人访谈对话，继而整理成文存档，如此历史善举，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只是读了田先生采访整理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还有其后由此而引发的理论文章《谈谈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落差》，让人突然对田先生的认识产生了巨大落差。始而惊讶，继而难受——不啻如骨梗在喉，简直就像被人塞了一嘴苍蝇，不吐不行了。

治史，第一要紧就是真实客观。老田的其他访谈文章不说，笔者作为重庆文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单以《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以下简称“口述史”，发于《世纪沙龙》网）一文所谈史实而论，田先生就大大背离了此一要义。稍览“口述史”，便可发现通篇漏洞百出，教人啼笑皆非。不仅难称信史，简直就在大误视听，错引读者，尤其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读者。下面略举数例：

关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该大字报是确立文化大革命大政方针的关键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向刘少奇公开摊牌，于1966年8月5日公布的重要文档。大字报将同年6、7月毛离京期间，刘主持中央工作，向各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一事，明确指责为“资产阶级专政”，是五十天“白色恐怖”。对于中国文革史上如此重要的常识性问题，“口述史”竟不知所云，胡诌一气。田文记述，重庆“搞抄家破四旧，乱打人，都是干部动员的结果。重庆执行抄家、伤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党委安排的，目的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重庆执行这些路线的人，就是市委组织起来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纠，正是因为各地的当权派都是这个搞法，毛主席才要写‘我的一张大字报’。”众所周知，所谓抄家破四旧，组织“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纠”，都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从而开始全国大乱之后的事情了，怎么成为8月5日那张大字报的起因呢？下面这段引文还可说明作者对文革史实的无知而非笔误。田文记述：“……市委在江北上横

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八一五罪行展览，说造反派学生都是流氓无赖，我们去调查过，发现都是市委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他们就是用这些手段镇压起来参加文革的。在工厂里面就更厉害了，有的人被开除、有的人遭到关押、批斗……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白色恐怖’。所谓“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发生的事件，俗称“八二八惨案”，事发时间是1966年8月28日，同样远在8月5日之后。

接下来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黄廉上北京参加毛泽东接见。

口述史说黄因为“江北上横街事件”惨遭迫害，“心里也很苦闷”，于是断然“北上取经”，在北京受到了文革接待站田姓干部的热情接待；还见了蒯大富；还参加了清华和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体育馆批判余秋里、郭沫若、林枫的大会；周总理的联络员还“开了一个华沙车来找我，又摆谈了一阵，问了一些情况。”“晚上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来看我们，王力讲了几句话”，最后，黄参加了毛主席8月31日的接见。

毛泽东于同年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确实不错。按老田所记录的黄的回忆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江北上横街事件发生在8月28日。重庆市委从决定用此事件对方兴未艾的造反派进行镇压，从组织准备、舆论准备，包括传单的编写、印刷等等，总需要一两天时间吧？事实是，当局对八一五派的大规模围攻镇压确实是从9月1日左右开始的。那么，就算8月28日第二天8月29日开始对付黄廉一个人，黄一个人马上出发上京，那么，重庆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当时发车时间是晚上8时许，运行时间是48个小时，黄到北京怎么也该是31日晚上了。如何来的及“早上六点钟出发，等到十点钟，整个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并等到“毛主席走下天安门跟群众握手”甚至“毛主席的手遭指甲划破”呢？更何况前面黄廉还需要完成坐周恩来的华沙车那一堆精彩节目？黄廉的时间如何安排得过来？

说到时间明显混乱，还有一例。

口述史说罗广斌对黄说“夺权没有中央支持不行”，要黄“去北京一趟”，黄遂“给周总理发了个电报，说重庆非夺权不可了，从生产和生活秩序看，从社会思潮看，都是一片混乱，为了不出现瘫痪局面，我把情况汇集了，说想到北京汇报。罗广斌借了400元路费给我，要我尽快去北京。”黄到了北京之后，莫名其妙被卫戍区关了又放了，文章说：“我走出卫戍区，就看到中国氢弹爆炸的喜讯。第二天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温白桦见我，告诉我重庆的革联会已经夺权”。

氢弹爆炸和黄被释放的第二天得知重庆夺权，显然是帮助黄回忆这段史实的关键语。对于中国国防科技发展史和重庆文革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发现，作者说到的几桩事情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我国公布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有两次，一是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二是1967年6月17日：氢弹空投试验成功。重庆夺权是1月24日，离第一次消息还差近一个月，文革夺权的始作俑者、大名鼎鼎的上海“一月革命”都还没有动手呢。而第二次氢弹爆炸，重庆造反派夺权已经过去近整整六个月。

作者不仅事件的发生时间东拉西扯，更要命的是对文革发展的政治线索也稀里糊涂。下面略举一例：关于首都红卫兵司令部和批判资反路线。

十分确定的史实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于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成立于9月5日。一司、二司均由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观点相对稳健或曰保守些。“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于9月6日。三司直接授意于中央文革小组，相对激进，按当时的说法，算是真

正意义上的造反派。当是时也，大规模的动乱刚刚开始，人们都还不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葫芦里买的什么药，三司绝对还是少数派，和三司处境相同的全国造反派都还处于严重受压的境况，直到十一国庆大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话、接着《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接着是中央工作会议，刘邓诸人检讨，全国大张旗鼓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遂由此始，“首都三司”和全国造反派的政治处境亦由此开起了顺风船。

令人费解的是，1966年9月黄廉上北京，北京红卫兵三分天下，局面晦明莫辨，一司二司气焰正盛呢，怎么就会有“一司成员”林怀打电话给黄，“说自己是一司的，现在爸妈不让出来了，红袖章也不带了，现在‘垮司令’相当风光，她把蒯大富称为垮司令。我出去到处走，看到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经被人砸了”？接下来的回忆更加荒诞不经：1966年9月份，黄廉就听了“王力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戚本禹讲粉碎走资派反扑的新胜利，关锋讲以革命促生产，以生产激励革命的辩证关系，最后是说情况已经清楚，线路已经明确，”1966年9月，中央文革一帮秀才成天就忙着到处煽动造反，搅乱形势，哪有心思讲“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1月全国全面夺权开始，造反派和保守派关系易位，一个上台一个下台，出于报复，原来以“生产”压“革命”的老保开始捣乱，开始堵火车，开始上京告状，这时候文革当局这时才确实开始连篇累牍大谈“抓革命促生产”了，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还专门给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贺电”，强调要反对经济主义、打退所谓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此事怎么被黄廉提早了整整四个月呢？

此类子虚乌有的东西，在口述史可说比比皆是，信手拈来。比如：“罗广斌当时是作协主席和重庆市团委书记”。事实是，罗广斌文革开始时仅仅为重庆文联专业创作员，从来没有当过什么作协主席或者团委书记。还有：鲁大东“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很不公正地把‘肖（泽宽）廖（伯康）李（芷洲）’打下去了”。事实是：肖等三人因为向中央反映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四川大搞浮夸风、高征购等问题，被李下令整肃，早在1963年5月重庆市委20次全委扩大会上就被搞掉了。当时市委书记是任白戈，怎么张冠李戴把事情扯到鲁大东头上呢！顺便说一句，重庆史料按职务大小排序，正式的提法都是“萧、李、廖”而不是“肖、廖、李”。而且李名的正确写法是“李止舟”而非“李芷洲”。

对于如此混乱、如此信口开河、不负责的史料（我们姑且还把它叫做史料吧）逐一指正，实在有点浪费时间，只好就此打住了。需要说明，由于日久年深，叙述者或失忆，或记忆错乱，或因为太过自恋，记忆的选择性发生了过多的不该发生的偏差从而导致资料真实性的错失，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有志于充当时代书记员的文档整理者，自己却是对上述缺失加以修正和补救的。方法之一，就是事前尽可能多地阅读业已存在的历史资料，认真研究和熟悉一下当时主要的、大的政治背景和斗争线索，以避免对某段历史、某个人物进行采访时，只能被动地当个录音机和速记员，闹出了瞎子配聋子、一个瞎说，一个浑记的笑话；方法之二：兼听则明。正因为年深日久，一个人的回忆难免靠不住，为确保史料的真实可靠，就必须多找一些当事人采访。黄廉口述中提到同派战友如李木森、虽属对立派而后来关系不错者如周家喻等，现今都还健在。田先生为何不找他们问问？匆匆忙忙就弄出这么一个东西，草草率率就弄到网上发布——坦率说吧，如此态度治史，不仅无益历史，无益研究，对于为文者本人的名声也有害无益。难怪多有文中所涉当事人看过此文都不甚了然，有愤激者甚至说，作者赚了钱，有精力有金钱写这样的文章，倒真不如用去嫖赌为好。

田先生占有的资料既然如此错误百出，基于此而写出的理论文革《谈谈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落差》，也就不足为训了。如果说一句话加以评论，就是，作者的立论的出发点还是“工人阶级天然伟大、天然团结、最富有革命精神、最具有战斗力，而知识分子天然动摇，天然机会主义，只配送去工厂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时代发展至今，什么事都讲究实事求是，讲



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老田先生的老皇历，还准备翻到何时呢？

~~~~~  
【研究评论】

评《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 青近军 •

(一)

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位在文革中直接吃尽了“四人帮”的苦头、饱受“四人帮”面对面迫害的老干部，因此，由他来写文革中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的确是最好、也是最权威的见证人。但是，在读了《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后，却深为之遗憾。

因为，这本洋洋20万字的回忆，原本是应可以写出很多精彩的历史细节与味道的，然而，细读该书，却常有沉闷乏味之感。因为，书中内容，大部分只是由一种现在已基本众所周知的宏大的叙史与政治的批判构成，而属于其个人经历情况细节的叙说，则篇幅不多；即便有的一些，也有些是含糊而过，未能向读者清楚展示。相比较同类作者的书籍，如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前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武光、前四川省委宣传部长马识途等老干部有关文革中其主持运动与挨整受迫害的历史回忆，陈丕显的这部回忆录，就大为逊色了。

(二)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内容中，所涉及到的重要历史而未能清晰叙述的事情，例如：

(1)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整罗瑞卿的中央“紧急会议”，二十多年来已被人们说得很多了，陈丕显是与会人之一，而且是到机场去接罗瑞卿的地方首长，原本他可以将此次会议的情况，在本世纪末，细细地作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以让后人全面了解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史上重要一页之所有面貌。然而，作者却除说了他去机场接罗的一事，有点细节外，其他有关会议的情况，则也是搬来一些众所周知的宏大叙史碎片，而未能提供任何新史料。使人读了，等于没读。

如果说，二十多年前，人们对那会议的叙述不能全面，尚还有“高层机密”观念的顾虑所致，那么，在近40年后的今天，再谈那些陈年往事，应是实在没有再躲躲闪闪的必要了。

(2)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6月，上海市委也于6月10日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动员大会，点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学术界、文艺界一些权威学者的名，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的典型，并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公开批判。

这件事，并不是什么造反派做的，而是当时仍以陈丕显担任第一书记、并尚在运转而行使权力的上海市委搞的。对于这个错误，陈丕显在书中提了一句，也列举了当时上海市下属单位，被大字报点了名的处级以上干部占80%。然而，当时，由他主持工作的上海市委，为什么要、是如何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学术界、文艺界权威学者打成“牛鬼蛇神”典型、将大部分基层干部进行整肃一事的详情经过，在这部回忆录中，却毫无叙述与描绘。

陈丕显遭到四人帮迫害，自然应受到人们的同情；然而，文革之初的上海市委，也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文化人，无端打成什么“牛鬼蛇神”，此事，作为前上海市委的领导者们，是不是也应该反省反省呢？

（3）文革中的上海所谓“一月风暴”，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即标志着造反派的造反行动，得到了当时的中央最高首脑机构的认可，而那个“一月风暴”在文献上的体现，便是当时上海市“工总司”等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等二个文告，以及当时党中央对其的欣赏与发电报表示的支持。

而这《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等二个文告，虽然是造反派组织起草的，但却是由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在上面签字同意并支持了的。

这一幕错综复杂的历史，其实应该详详细细的叙述清楚，让后人对当时的情况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仅仅说参加了1月8日下午在锦江饭店召开的那个会议及在文告上签字那几句话，就含糊带过了那段重要的历史细节。

（4）陈丕显在文革中长期被“四人帮”迫害而监护关押，从1967年1月12日起失去自由，2月底则又由夺了权的上海市革委会予以“隔离审查”，并派解放军战士看守，直至1974年11月1日被宣布可以回家，长达八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是怎么过来的呢？他的具体生活会如何？他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非人待遇与摧残？他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当时曾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思考与想法？等等，这些情况，都是重要的历史内容。可惜，在这部书中，却也未能见详细描述。他只是用较多的篇幅辩说四人帮欲整他的那几个政治问题，而除了透露了一句他被关押在荣毅仁原来的花园洋房、每月30元钱的生活费外，再没能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

而上述武光与马识途的回忆录中，则较详细地叙述了他们如何被批判被关押监护数年以及受虐待的过程及情况，使后人对当时省级领导干部文革中被“监护”（即是由解放军站岗看守长期关押，而不是由造反派群众临时将其囚禁）的情况，能有较清楚的了解。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武光，因为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文革中就坐了七年监狱，又被流放农场三年。这些情况在他的回忆录中，都细细作了叙述，而且，还说了那时“北航”两派红卫兵都是保护他的等复杂情况。

（三）

一部原本应能写得很精彩的回忆录，为何却出得这样不理想呢？

想必不会是作者的本意所拘，因为，这段历史是他最直接遭受四人帮迫害的铁证，四人帮在上海折磨了他八年的那些苦难，他应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猜想，应该是帮他写作的秘书们，在这方面水平太低所致。

也许，是由于他们年轻，没有经历过文革，又没受过这段历史的全面教育，因而对文革只有“十年动乱”“一场浩劫”这样一种抽象的认识，故根本不可能知道文革还有那么复杂的过程，也更不知道在文革历史中，哪些历史画页是属于重要篇章，哪些历史细节是需要细细描述。所以，一个重要历史老人的回忆，经他们的手，便成了一本“编著”性作品，而让水份淹没了价值。

可惜。

□ 2005年1月12日

~~~~~  
【往事如烟】

我们学校的叛国者

• 歪脖子树 •

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国内武斗四起，工矿停产，交通阻塞，到处乱成一锅粥。即使如此，国家的秘密警察力量仍然有条不紊地运行着，机警地监视着社会各层，表现出神秘、高效、无孔不入的特点。中国科学院的集团叛国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侦破，又不动声色地一网打尽，就是他们的杰作。猎犬就是猎犬，即使它跛一只足或者瞎一只眼，照样也能嗅出猎物的踪迹。这个案件涉及到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其他多个研究所，牵涉到的人有学者、教授、讲师、研究人员。被公安部定为“六八一专案”，意思是六八年的第一宗国家大案。案子的罪名是最为唬人的那一种：“叛国”。被这叛国罪法网兜进的猎物，基本上都是朝鲜族人。但是他们投奔的对象不是列为一号敌人的美帝苏修，也不是逊居二号敌人的日本，更不是本家的骨肉亲敌台湾。他们投奔的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说到朝鲜，一般中国人马上会冲口说出一串标准的词汇描述：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中国朝鲜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实际上中朝关系也象四季天气，有个阴晴圆缺的变化。就算是唇齿关系吧，也免不了有大板牙咬着厚嘴唇的时候。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说得直接一点，实际是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再说得入骨一点，是党的首脑和首脑之间的关系。自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顶上牛，玩起了抢椅子的把戏（国际共运第一把交椅），两个人都自封马克思的嫡传弟子，都希望有一帮兄弟出面拥立自己承袭掌门人。毛泽东一向自认为有大恩于金日成，满以为小老弟会带个好头，不料金日成却支支吾吾，来个两面都不得罪。公开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只有（阿尔巴尼亚）霍查一人。这种冷落场面自然令毛舵手失望，由不得要老羞成怒。这怒气当然先冲着原来最亲近的弟兄发作。文化大革命不久，就有“朝修”的称呼，可不是空穴来风。文化大革命目的是挖掉中国的赫鲁晓夫，连泥带土的牵涉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时间专家扫厕所，教授戴高帽游街，闹得斯文扫地人心惶惶。由于文化关系，中科院的朝鲜族知识分子之间，节日假期会有一些聚会，有时也有朝鲜留学生参加。在太平年间，这聚会是表现朝鲜族能歌善舞的场合；在文化大革命多事之秋，这些人舞兴不高，却不禁表达了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忧虑，感到郁郁不得志；有人提出到朝鲜发展的设想，引起一些人的呼应。在聚会后，有几个人认真行动起来。委托朝鲜留学生到朝鲜大使馆预先打招呼。朝鲜驻华大使馆也暗中派人和他们接触，表示朝鲜建设很需要人才。鉴于大使馆的地位，话说到这份上，实际是一个鼓励，使得这些人弃华投朝的情绪高涨起来。在一次聚会上，科大教工朴洪道模仿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流行方式，举起酒杯，提议敬祝伟大领袖金日成万寿无疆。还有人趁着大串联的混乱，到鸭绿江边游泳，勘探边界管制情况，选择越境的陆路和水上路线。他们还得到消息：朝鲜市场打火机火石奇缺，在中国才两分钱一粒，到朝鲜要十倍二十倍的翻价。火石体积小，易藏匿，比带钱安全。于是有人开始采买火石，准备日后变卖做为落脚费用。就在他们准备分头实施偷越国境计划时，全部有关人士，突遭拘禁。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还又一次应验了。可以想象，中朝关系正处在低潮，文化大革命又处在兴头上，此时此刻做这等大逆之举，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国科技大学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刚开过动员大会，就有了成果，一天早上，忽然传来消息：

“又有人跳楼了。”

“是谁？”

“二系的教工朴洪道。”

“什么问题？”

“不知道——反正有问题呗！”

朴洪道是物理系的讲师，他是中科院叛国案中的重要人物，经不住压力，跳楼自尽了。当时关闭他的房间在二楼，趁守护一时没留意，他突然破窗而出，头直冲水泥地面，倒栽葱落下，脑颅破碎，可见其求死意志坚决。救护担架还没送到校医院，就咽气了。鉴于当时叛国案还没公开，好多人糊里糊涂不知道他为什么死的。倒是朴老师自己死得明明白白。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到后期，忽然一天召开批判投修叛国分子金昌宪大会，地点不在平时的大操场，而是在学校礼堂。金昌宪被一边一个红卫兵战士夹持着，反剪双臂，用超低空俯冲姿态，押上舞台，这是文革的经典方式。批判人历数金昌宪图谋叛国的罪行，人们才知道原来他和朴洪道同案。在数落到阴谋叛国分子们举杯敬祝金日成万寿无疆时，随即有人带头高呼口号：“打倒金大胖子！”“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是呀！这“祝福万寿无疆”，是专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仪式，你金日成一介夜郎小邦之君，也赶来凑热闹，岂不坏了孔周大礼？批判会结束前，当即有人登台宣布纪律：批判会内容不可外泄，批判会上的口号不可在公开场合呼叫——会场的气氛既严肃又神秘，让参加批判会的人觉得自己背负了一项国家的重任，把持了党的核心机密。

金昌宪讲师是近代物理系实验室主任，30多岁，正处在学术的黄金时代。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学识精深，颇受同事同学的欢迎。他还特别爱整洁，衣服穿得有棱有角。在半年多软禁期间，搜去了他的刮脸刀片，他却用一把剪指甲钳，一根一根地把胡子修理的整整齐齐。文化大革命乱糟糟的形势，令他心怀不满，加上他的高丽民族情结，就琢磨着到朝鲜打工去，这不是脑袋缺根弦又是什么？金昌宪老家距离朝鲜边境不远，他也到过鸭绿江游泳。据他交代，他曾游到江心，只要再划几下水，就到了朝鲜，只是想到老婆还在北京，放心不下，终于返回了。回到北京，看到文化大革命愈加高涨，没有结束迹象，又后悔没划过去。冷静下来以后，他开始打听哪里可以买到打火机的火石，悄悄存了二百块火石的现货。这二百块火石，成了他赖也赖不掉的叛国证据。话又说回来，当金昌宪看到已经身陷罗网、无路可逃时，也就不再抵赖什么了。金昌宪没有走朴洪道一死了之的道，走的是求生的路。他竹筒子倒豆子，彻底坦白，以求得宽大处理。六九年春天，他被递交到近代物理系工程专业，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当时全体同学被抽调到北京西郊晓幼营修建东方红炼油厂铁路，金昌宪随同学一同来到工地，开山、搬石、铺路。

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已经大大不同于六六年形势，人们激情衰退，逍遥派大行其道，对文化革命质疑的情绪日益公开化。学生对工、军宣队占据学校不满，常常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现出来。从北京造纸厂来的一位女工，经常摆出一副从毛主席那里领了上方宝剑，要来管教管教学生的姿态，她的名字叫姚玲。学生们用谐音转义为“摇铃”。只要有同学做出摇铃的手势，或者嘴里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大家马上意会到“姚玲师傅到”。在工人师傅走近工地的时候，随口编的打夯歌就响起来：

领唱：修铁路呀！众应：咳么！

流大汗呀！咳么！

工人师傅，咳么！

站着看呀！咳么！

该用力呀！咳么！

就用力呀！咳么！  
只看不干！咳么！  
王八蛋呀！咳么！

姚玲师傅看同学干得热火朝天，开始还挺高兴，但很快品出滋味不对头，不由勃然大怒，马上返回造纸厂，再也不回来了。

另外一位师傅，是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人很忠诚老实，只是长相差些，生了一脸麻子。同学们背后叫他“麻师傅”。有两次有人叫漏了嘴，当面叫他“麻师傅”，他还懵懵懂懂地纠正：“马师傅已经回厂了，我姓王”。除了一脸麻子，突出的还有一副大肚皮，鼓绷绷的像怀孕足月的妇女。麻师傅的肚子好像装满了旧社会的苦水，并随时准备倒给大家喝。他说那幅大肚皮，完全是在旧社会吃糠咽菜撑大的——让麻师傅这么一解释，那幅丑陋的大肚子，反而成了值得珍重的阶级教育的活教材。班上从农村来的几位同学并不买他的帐，说旧社会过来的人多了，没有几个象他老兄这么大肚皮，六零年困难时期，我们也吃糠咽菜，肚子也没撑得像他那样。铁路工地的帐篷，到了夏天，闷热难熬，大家都打了赤膊。麻师傅脱掉上衣，肚皮不仅大，而且也脸上一样麻麻点点，有一个同学不禁开口说：“师傅的肚子真大呀！”这一下子又捅开了话匣子，麻师傅清了清喉咙，提高了嗓音：“同学们，这都是万恶的旧社会——”突然“咚”的一声响，有人从侧后方在他肚皮上猛击一掌，周围的人被逗得个个捧腹大笑。使得一堂严肃的阶级教育课，变成了一场笑话。麻师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认准这是个政治性问题。可是，当时他正在酝酿情绪，精神集中在忆苦思甜的讲演措辞上，根本没看到是谁发出的霹雳掌。他只好把同学一个一个的找去谈话：“小秦呐！你要打消顾虑，放下包袱，敢于对坏人坏事揭发。你站的位置离我不远，应该看到是谁打的我呀！”他没想到，正是面前的这个装模做样的小秦抽了他一巴掌。

一天傍晚，大家收工后刚擦洗完身体，有的还没来得及泼掉脏水，麻师傅一脸怒气地跑进帐篷，大叫：“紧急集合，紧急集合！阶级斗争新动向！”工程班近20人，马上列队。麻师傅激动地训话：“我们不能只埋头建设，看不到阶级斗争，叛国分子金昌宪，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脱光屁股，破坏群众纪律，对抗监督改造，是孰可忍孰不可忍！”金昌宪以待罪之身下放劳动，干起活来十分卖力气。让监督他的同学都看得过意不去。他抡起大锤来乒乒乓乓的不停，浑身总是汗淋淋的，衣服像浸过水。每天完工，他都要在擦洗过身体后，更换内衣。如果在帐篷里换，有许多同学在场，似乎当众裸体有点不好意思，他就选在两个帐篷之间的狭窄夹道里。看到两端没人，迅速扒下湿淋淋的内裤，套上干净的。噼里啪啦，总共也就是两三秒的曝光时间。偏偏这一天碰巧了，麻师傅经过夹道，看到金昌宪暴露下体的一幕。通常的批判，人们总会从毛主席语录里拨拉出两条似是而非的话来，镶嵌到自己的发言里，显示自己的批判正当性。但是对于金昌宪暴露下体的批判，却不知道该引用哪条语录，麻师傅咕噜了半天，舌头转来转去还是那两句话，“这里靠近农村，如果让人家大姑娘小媳妇看见多不好”，最后，把这“如果——多不好”上纲到“破坏和贫下中农的关系”，“破坏东方红炼油厂的铁路工程建设”。同学们见到麻师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瘾头也差不多过足了，咋呼了几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散场。这是金昌宪最受冤枉的时候，长期的拼命表现，因为脱了个裤衩，被一笔抹杀了。

金昌宪也有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天深夜，忽然集合的哨子响起，高音喇叭播出紧急通知：“全体贫下中农同志们，全体革命师生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让我们热烈庆祝这一伟大指示的发表，现在全体集合，马上游行，”这种“半夜机叫”，大家经历得多了，早产生了厌恶。我们帐篷的同学不约而同，用被子裹上脑袋，装做听不见，最后军宣队到每个帐篷里拉开灯，吹着哨子凑近同学的脑袋，同学们依旧不动。一位工宣队的成员走进帐篷，随手抱起一架手风琴说：“大伙既然不想起来，我也不想让你们睡，我就给大伙拉一段曲子提提精神。”说着就呜呜拉拉地弹奏起来，他接连表演了几支曲子，大家依旧直挺挺躺在床上，毫不为所动，

最后这位多才多艺的工宣队员也只好没趣地退出帐篷。其他帐篷情况类似，折腾半小时后，工、军宣队领导才决定：同学们在工地上干了一天，都累了，明天再游行庆祝吧。一直喳喳叫得高音喇叭也嘎然停止，周围又陷入一片平静，这时同学们才从被窝里伸出脑袋，抑制不住哈哈大笑。金昌宪这时候很为难，他既不敢象同学一样装傻，又不便脱离班上自己行动，就穿好衣服，站在帐篷口尴尬地站着。直到通知游行取消，他才敢回到床上。虽然他心里也笑，却又不敢笑出声来。

中朝关系在迅速变化，一段时间两国又达到某种谅解。后来从鸭绿江越过边境的人，又被朝鲜政府遣返中国，这些被五花大绑的越境者，嘴里还勒紧麻绳。因为他们大骂金日成，朝鲜人民军只好取消他们的发言权。叛国者被中方接收后，很快被公开枪毙。叛国投朝修的潮流，很快被制止了。朝鲜族学者叛国投修的案子被侦破，即使对涉案者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举起酒杯祝福鸭绿江对岸的独裁者万寿无疆，和祝福此岸的独裁者万寿无疆，实在是没什么差别。

金昌宪罪名一年后就淡化了。其中一个原因，70年，中国科技大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挖出了大批帝修反别动队。在他被监督劳改的近代物理系工程班上，20名学生，有12人被立案审查，8人给以处分结论。其中5人，有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论。这要在地方单位，这些学生被枪毙也够分量。在这里，却有点法不治众效应。要知道，工程班的学生，属于绝密级专业，他们经过严格政审，是党和国家充分信任的一群。在反革命分子美不胜收的近代物理系，金昌宪的孤立感渐渐消失了。随着中朝关系的回春，叛国投修的罪名也没人追究了，到了70年代末，在倡导科学技术兴国的气氛下，这些人又担负起科技工作，回归社会主流了。

中美建交，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政治猿人进化到政治新人，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毛时代从未有的进步，形成了朝鲜不如中国的情况。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